



臣愚不肖，蓋嘗試矣。世先後之臣，而切國陛下能施一萬，以爲所願生者，決在於不與，而陛下深濟之。

（一）當後者，其在於其早，（二）臣非敢以爲然也，時其所見在遠於昔者，是以因其近而爲以恭儉，其王之帝王，誠世而不能有，爲者，陛下二日甚而有之矣。夫以大樂之安，濟之以求海之心，施之於事，重事而不成，無敢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長矣，而臣不知此，天下之弊日益於朝。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

宋代蜀文輯存校補

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



世，天下之人，知可以過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盡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燔灼，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敢不陳，覽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

今世之患，莫過於無財也。財者萬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以立，事之所以以成，第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之計，以爲邊中穀斛入錢，雖二百萬斛，羌人不致動矣。諸葛亮居兵如神，而以補遺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步，苟有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

陛下所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廣山之戎，將奪其險阻，縱橫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遽喪失業，橫山之寇，厭苦思漢，而又乘其驚擾，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城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驚發，亦既入踐其國，係屬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收，獲其人而不收，雖有成功而不敢爲也。其終卒至於廢難，雖臣而猶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橫生之前，而獲之於既發之後，是以爲是失也。臣之誠無他，以俟其後報。

臣未明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難言四夷，臣服異類，是懷治之跡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臣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

今豈陛下微前事之失，出稅府之財，使內部之租賦，富漕運之吏，備沿邊之需，極以此歸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稅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部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不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及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舉賴焉，故將使財勝其事，而舉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舉無不濟。則富車馬也，事者具所載物也，載物者當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載，然後可以以爲善也。而車不備，物不備而輪不順，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竭矣，而土用不足，平居備備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斃車驅馬而引丘山之戰，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危禍之變，陵殺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費財一於臣之所謂費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著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盡財者盡去，雖不求費財，然而求財之不費亦不可絕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

盡財者三：一曰兵，二曰刑，三曰費。

死軍之備，謂源古之所以置吏之備，有兵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置民而置官，置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則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試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郡縣，出入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去之來者無賴，而官有限額，於是僅守則知之法，而官法始



重慶大學出版社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10@ZH005)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2012.110)

宋代蜀文輯存校補



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

重慶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代蜀文輯存校補: 全6冊/傅增湘原輯; 吳洪澤補輯. —重慶: 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624-8426-4

I. ①宋… II. ①傅…②吳… III. ①古籍—中國—宋代—選集 IV. ①Z42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227973號

宋代蜀文輯存校補

Songdai Shuwen Jicun Jiaobu

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

責任編輯: 鄧曉益 雷少波 張家鈞 版式設計: 吳洪澤
責任校對: 劉雯娜 責任印製: 趙 晟

*

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出版人: 鄧曉益

社址: 重慶市沙坪壩區大學城西路21號

郵編: 401331

電話: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學)

傳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網址: <http://www.cqup.com.cn>

郵箱: fxk@cqup.com.cn (營銷中心)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重慶川外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221.5 字數: 3721千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426-4 定價: 780.00元 (全6冊)

本書如有印刷、裝訂等品質問題, 本社負責調換
版權所有, 請勿擅自翻印和用本書
製作各類出版物及配套用書, 違者必究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收錄和整理巴蜀歷史文獻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〇一〇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周邊傳統“巴蜀文化”區域內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新、編纂最科學、使用最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以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和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巴蜀全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重版。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整理巴蜀文獻 傳承優秀文明

——《巴蜀全書》序

舒大剛 萬本根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國文化，群星璀璨。在祖國大西南，自古就傳承着一支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個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區，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號稱“陸海”“天府”；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是古代長江文明的源頭，與“齊魯文化”“荆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同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載體——巴蜀文獻，因而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

一、回顧巴蜀文化 提高文化自覺

巴蜀地區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是人類早期的發祥地之一。考古發現，這裡有距今二百零四萬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萬五千年的“資陽人”。這裡不僅有大禹治水、巴之廩君、蜀之五主（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王朝）等優美動人的歷史傳說，也有寶墩古城、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小田溪遺址、李家壩遺址等重大考古發現。商末周初，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以及勇銳的巴師，曾參與武王伐紂。春秋戰國，巴濮楚鄧、秦蜀苴羌，雖互有戰伐，亦相互交流。秦漢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產，更是外禦強辱、周濟天下、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持久繁榮的戰略屏障和天然府庫。

在祖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常璩、陳壽、陳子昂、趙蕤、李白、蘇軾、張栻、魏了翁、李心傳、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張瀾、謝持、張培爵、吳玉章、楊庶堪、黃復生、尹昌衡、鄒容、熊克武、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鄧小平等革命英傑，他們超拔倫輩，卓然振起，敢為天下先，勇為天下創，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演繹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劇。

歷代巴蜀學人在祖國文化的締造中，成就良多，表現突出，許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導價值。巴蜀兒女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使這種創造發明常常居於全國領先地位，成為祖國文化寶庫中耀眼的明珠。

在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中國素號“三教互補”，“儒學”“佛學”與“道學”構成中華思想文化的主幹。從漢代開始，巴蜀地區儒學就十分發達，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建當時全國首個郡國學校——石室學宮，推行“七經”教育，實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風丕變，並化及巴、漢，促成中國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形成，史有“蜀學比於齊魯”之稱。巴蜀地區是“仙道”派發源地，東漢張陵在蜀中創立“天師道”，中國道教正式誕生。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四川也是其重要傳播區域，楊慎考證說大邑縣霧中山乃佛教由南道進入中國的第一站。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大師輩出。自漢胡安（居邛崃白鶴山，以《易》傳司馬相如）、趙賓（治《易》持論巧慧，以授孟喜）、嚴君平（隱居成都，治《易》《老》）、揚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輩出。晉有范長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蘇東坡（著《東坡易傳》）、房審權（撰《周易義海》百卷）、魏了翁（撰《周易集義》《周易要義》）、張栻（著《南軒易說》）、李石（著《方舟易說》）、李心傳

(著《丙子學易編》),元有趙采(著《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黃澤(著《易學濫觴》)、王申子(著《周易輯說》),明有來知德(撰《周易集注》)、熊過(著《周易象旨決錄》),清有李調元(著《易古文》)、劉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發明“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學,普及面廣,自文人雅士、方術道流,以至引車賣漿之徒、籬桶織履之輩,皆有精於易理、善於測算者。理學大師程頤兩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學在蜀”之歎。

巴蜀“史學”名著疊出、斐然成章。陳壽《三國志》雅潔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華陽國志》體大思精,肇開方志體;譙周《古史考》,開古史考證之先聲;蘇轍《古史》,成舊史重修之名著。至於范祖禹(撰《唐鑑》,助司馬光修《通鑑》)、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偁(撰《東都事略》)、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暨《朝野雜記》《宋會要》),更是宋代史學之巨擘,故劉咸忻有“史學莫隆於蜀”之說。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禹娶塗山(今重慶南岸真武山)(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爲《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陽(今瀘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詩,《詩經》傳其四篇(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一)。“文宗自古出巴蜀”,“漢賦四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居其三。陳子昂、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五代後蜀《花間集》和北宋東坡詞,開創宋詞婉約、豪放二派。“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時輝耀於“唐宋八大家”之林;楊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詩人例到蜀”,漢晉唐宋以及明清,歷代之遷客騷人,多以巴蜀爲理想的避難樂土,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藝情藻思,促成創作高峰的到來。杜甫、陸游均以巴蜀爲第二故鄉,范成大、王士禛亦寫下千古流芳的“入蜀記”和“吳船錄”。及乎近世,沫若、巴金,蔚爲文壇宗匠;蜀謳川劇,技壓梨園群芳。

“三蘇”父子既是文學大家,也是“蜀學”領袖;綿竹張栻,不僅傳衍南宋“蜀學”之道脈,而且創立“湖湘學派”之新範。明末唐甄撰《潛

書》，斥責專制君主，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譽為“上繼孟、荀、陽明，下啓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撰書數百種，區分今學古學，倡言托古改制，錢基博、范文瀾俱譽其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驅。新都吳虞，批判傳統道德，筆鋒犀利，被胡適譽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領域，秦蜀守李冰開建的都江堰，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人類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漢代臨邛人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先使用天然氣煮鹽的記錄。漢武帝徵閩中洛下閎修《太初曆》，精確計算回歸年與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陰陽合曆”的範本。楊子建《十產論》異胎轉位術領先歐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學與方劑學相結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藥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譜》詳錄蔗糖製作工藝，是世界上有關製糖技術的首部專書。南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將中國數學推向古代科學頂峰，其“大衍求一術”領先西方世界同類算法五百年。

至於巴蜀地區的鄉村建設和家族文化，也是碩果累累，佳話多多。他們或夫婦齊名、比翼雙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楊升庵與黃娥）；或兄弟連袂，花萼齊芳（蘇軾、蘇轍，蘇舜欽、舜元，李心傳、道傳、性傳等）。更有父子祖孫，世代書香，奕世載美，五世其昌：閩中陳省華及其子堯佐、堯叟、堯諮等，“一門二相，四世六公，昆季雙魁多士，仲伯繼率百僚”（霍松林語）；眉山蘇洵、蘇軾、蘇轍及子孫輩蘇過、蘇籀，並善撰文，號稱“五蘇”；梓州蘇易簡及其孫舜卿、舜元，俱善詩文，號稱“潼山三蘇”；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傳、道傳、性傳，俱善史法、道學，號稱“四李”；丹稜李燾與其子壁、臺三人，俱善史學、文學，時人贊“前有三蘇，後有三李”。降及近世，雙流劉沅及其孫咸榮、咸炘、咸煥，長於經學、道學與史學，號稱“槐軒學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綜觀巴蜀學術文化，真可謂文章大雅，無奇不有！其先於天下而創者，則有導夫先路之功；其後於天下而作者，則有超邁古今之效！先天後天，不失其序；或創或繼，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獻 促進文化興邦

歷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富省。巴蜀上古歷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春秋》等華夏文獻中都有記錄，同時巴蜀大地還孕育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漢統一後，歷代巴蜀學人又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的古典文獻。唐代中後期（約八世紀初），成都誕生了“西川印子”，標志着雕版印刷術的正式成熟，大大推動了包括巴蜀文獻在內的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產生的巴蜀古文獻不下萬餘種，現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種以上。

巴蜀文獻悠久綿長，影響深遠，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漢晉的竹簡、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經史子集，三教九流，歷歷相續不絕，熠熠彪炳史冊。巴蜀文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舉凡政治之興替、經濟之發展、文化之繁榮、兵謀之奇正、社會之變革，以及思想學術之精微、高人韻士之風雅、地理民族之風貌、風俗習慣之奇特，都應有盡有，多彩多姿。它們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徵。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在歷史上，許多學人曾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總集、全集和叢書。《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或許是巴蜀學人著述的首次彙集。五代的《花間集》和《蜀國文英》，無疑是輯錄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總集。宋代逐漸形成了“東坡七集”（蘇軾）、“樂城四集”（蘇轍）、“鶴山大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以及《三蘇文粹》《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慎的個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入蜀為官的曹學佺

還纂有類集巴蜀歷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資料大全——《蜀中廣記》。清代，李調元輯刻以珍稀巴蜀文獻爲主的《函海》，可視爲第一部具體而微的“巴蜀文獻叢書”。近代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爲巴蜀文獻的系統編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嘗試。

二十世紀初，謝無量曾提出編纂《蜀藏》的設想，因社會動盪而未果。胡淦亦擬編《四川叢書》，然僅草成“擬收書目”一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達，國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製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可惜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實施，巴蜀文獻仍然處於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毀損的狀態。

二〇〇七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省紛紛編纂地方文獻叢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燃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建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將整理巴蜀文獻提到議事日程。經過多方論證研究，二〇一〇年一月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將四川大學申請的《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四月又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將《巴蜀全書》列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千百年來巴蜀學人希望全面整理鄉邦文獻的夢想終於付諸實施。

《巴蜀全書》作爲四川建省以來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將對自先秦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的著作或內容爲巴蜀文化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和整理研究，並予以出版。本工程將採取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一是編製《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古今巴蜀學人曾經撰有大量著作，這些文獻在歷經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生滅聚散，或存或亡，若隱若現，已經面目不清了。該計劃根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旨趣，擬對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

文獻的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目錄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汗牛充棟，它們是研究和考述巴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這些文獻，我們將採取三種方式處理：首先，建立“巴蜀全書網”，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獻全文資料庫”，向讀者和研究者提供儘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資料。其次，本着“去粗取精，古為今用”的宗旨，按照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三結合”的原則，遵循時間性、代表性、地域性、獨特性“四統一”的標準，從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獻中認真遴選五百餘種精品文獻，特別是要將那些在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首創性和獨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獻彙集起來，進行校勘、標點或注釋、疏證，挖掘其中的思想內涵和治蜀經驗，為當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服務。第三，根據巴蜀文化的歷史實際，收集各類著述和散見文獻，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碑刻等專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巴蜀地區自古以來的刻書、藏書事業都很發達，曾產生和收藏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歷來是文獻家收藏的珍品。這些文獻既是見證古代出版業、圖書館業發展的實物，也是進行文獻校讎的珍貴版本，亟待開發，也需要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百餘種巴蜀文獻珍稀版本進行修復、考證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過以上三個系列的研究，庶幾使巴蜀文獻的歷史得到彰顯，內涵得到探究，精華得到凸顯，善本得到流通，從多個角度實現對巴蜀文獻的當代整理與再版。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蜀學復興，文獻先行。“《巴蜀全書》作為

川版的‘四庫全書’，蘊含着歷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體驗和智慧結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園。”（《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會議文件。下同）《巴蜀全書》領導小組要求，“我們一定要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打牢四川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基礎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巴蜀全書》編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義。特別要看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幾百年來巴蜀學人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傳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還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進，都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活動，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給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當代復興帶來契機，為“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有鑒於此，《巴蜀全書》領導小組明確要求，要廣泛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共襄盛舉。這一決策，實乃提高《巴蜀全書》學術水準和編纂質量的根本保障。領導小組還希望從事此項工作的學人，立足編纂，志在創新，從文獻整理拾級而上，自編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揚，自弘揚而創新，“利用編纂出版《巴蜀全書》這個載體，進一步健全研究巴蜀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以編促學、以纂代訓，大力培養一批精通蜀學的科研帶頭人和學術新人”。可謂期望殷切，任務艱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願學焉。《巴蜀全書》的編纂希望為巴蜀的文化建設和“蜀學”的現代復蘇擁篲前趨，至於搭建橋梁，開闢荆榛，上繼前賢，下啓來學，固非區區之所能，在此僅樹其高標，以俟高明云爾！

二〇一四年八月

前 言

《宋代蜀文輯存》是近代著名文獻學家傅增湘編纂的一部地方文章總集，旨在搜羅宋代巴蜀地區作家別集以外的文章，歷時十六年編成，總計一百卷，收作者四百五十餘人，文章二千六百多篇，蘊含有關巴蜀地方文學、文獻以及蜀學研究的珍貴資料，內容涉及思想、政治、軍事、經濟、法律、天文、地理以及工農業生產等多個方面。因此，將《宋代蜀文輯存》整理出來，輔之以“篇目分類索引”，新撰“作家小傳”等，將大大豐富有關蜀學的研究手段，拓展研究範圍，弘揚巴蜀文明，促進地方經濟建設，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宋代蜀文輯存》的纂輯

《宋代蜀文輯存》一百卷，近人傅增湘纂輯。

傅增湘（一八七二—一九五〇），字沅叔，別號書潛、雙鑿樓主人、清泉逸叟、長春室主人、藏園老人等，四川江安縣人。光緒二十四年進士，曾任直隸提學使。辛亥革命後，歷任肅政廳肅政史，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曾任教育總長。“五四”運動中，因反對北洋政府罷免蔡元培，受牽連免職，此後即潛心收藏圖書和研究版本目錄學。一九二七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一九二九年赴日本訪書。總計藏書逾二十萬卷，不乏宋金元刻本及明清善本，是近代著名的藏書家。精研目錄學和版本學，著有《藏園群書經眼錄》，刊有《雙鑿樓叢書》《蜀賢叢書》等。《宋代蜀文輯存》則是他嘔心編纂鄉邦文獻的代表作。

所謂鄉邦文獻，一般是指編者故鄉人物著述、鄉土史志以及地方金石版刻文獻等。傅增湘對鄉邦文獻的摯愛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鄉邦文獻的刻意收集，二是對鄉賢著述的編刻傳揚。傅先生對鄉邦文獻的摯愛，有口皆碑。在他七十歲高齡時，曾傾盡家財收購宋蜀刻本《南華真經》，“明知舉之將力窮於絕贖，設使縱之，必悔失於交臂。審慮徘徊，情難自己，遂毅然舉債收之。”又如明初刻本《蜀鑑》“詳於江山險易、道里遠近及歷代戰爭餉運之徑途，要有深旨”，他收藏之後即加以訂正，“異日當取余校本重訂刊行，以饗鄉人，倘得嗜學之士，就郭氏之例，採宋元以來之事迹，輯成續編，則裨益於鄉國，其功尤偉矣。”至於收

藏鄉邦文獻的目的，他在《宋代蜀文輯存序》中，有明確的表述：

余自髫歲離鄉，寄迹京津，歲月悠悠，俄然老大。中間祇通籍後得假歸掃墓，故於蜀中風物，夢寐難忘，嘗思生為蜀人，宜於故鄉薄有建樹。事會不偶，此願未償，而懷土之思，久而彌摯。生平粗知學問，仰承祖訓，尤嗜藏書，凡鄉人遺著及蜀中故實，力勤蒐攷，冀為他時表彰蜀學之資。先刊成《蜀賢叢書》，自宋本《揚子方言》迄於元本《道園遺稿》，凡十有二種。嗣有志於蜀文，乃徧收蜀人遺集，舊刻難逢者則別求寫本，寫本不得者則盡力傳鈔，自《咸平集》以下至《則堂集》，通十五家，咸粲然大備。《蜀中廣記》百餘卷，亦依文津閣本錄副存之，昕夕掇摩。又旁及紀傳雜誌諸書，以供探討。於是蜀中人物與夫氏族之源流，固已備知其領要矣。余以雅好丹青，因得博觀圖史，上自館閣之儲，下而坊肆所鬻，旁及都邑之書府，南北之藏家，偶有異編，咸得寓目。且交游既廣，氣誼相孚，尺簡時通，一紙可假。至於海上之涵芬樓，舊京之北平、東方兩館，時為訪書，與有雅故，志乘之富，冠絕一時，新舊駢羅，余可按圖而索焉。

可見，傅先生刻意收集鄉邦文獻，旨在有所纂述，“表彰蜀學”，也完成了兩部大著：一是編刻《蜀賢叢書》，收書十二種，均為影印宋元珍本蜀賢著述；二是編輯《宋代蜀文輯存》，為此，他曾向東方圖書館及張元濟商借大量藏書^①。

傅先生編纂《宋代蜀文輯存》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初完稿並刊行，可見他對此書的用心良苦。孫鴻猷序稱：“昔楊升庵編纂《蜀藝文志》，越二十八日而書成。先生雪纂星抄，歷十六年之久，積稿充於棟宇。其用心之苦，肆力之勤，執事之敬慎而強毅，以視前賢為何如也！”龍門書店重印版前載劉子健《重印小引》說：“傅先生的編纂，是極有系統，極詳盡的整理。因為是在抗戰中淪陷區出版的，不但流傳不廣，連知道有這部書的都不多。重印以後，一定對於今後從事研究宋代的學人，有很大方便。”

此書刻印於一九四四年，因工程浩大，造價昂貴，傅先生不得已出售宋元抄校本一百多種，並在友人孫仲山資助下，再加陶心如親自督工，纔印成二百五十

^①參徐雁平、武曉峰《傅增湘先生對蜀中文獻的收集與傳播——兼談〈宋代蜀文輯存〉的編輯出版》，《四川圖書館學報》，一九九五年三期，第七十四頁。

部。其時在日佔區，傅先生面對倭寇佔我領土、亡我文明的雙重侵略，編纂並出版一部包含大量宣揚抵抗外族侵略文字的著作，需要多大的膽識和勇氣！其中蘊含的愛國深情和對故土的眷戀，更是不言自明。儘管此書在當時流傳不廣，但它在後世爲人所重，影響逐漸擴大，却是理所當然。一九七一年香港龍門書店影印，一九七四年臺灣新文豐出版社再度影印，二〇〇五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發行，各大圖書館收藏，學者引用滋多，也引起了研究者對該書的重視。

二、繼承和發揚蜀人編纂總集的傳統

巴蜀學人素來注重鄉邦文獻，也有編纂地方總集的傳統，從宋代的《成都文類》，到明代的《全蜀藝文志》，再到近代的《宋代蜀文輯存》，以及今天的《歷代蜀詞全輯》和正在編纂中的《巴蜀全書》等，爲我們展現了古代巴蜀地區燦爛輝煌的創作成就，也提供了極爲豐富的文獻資料，滋潤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同時，由於僻處一隅，對瞭解中原文化造成一定障礙，蜀籍先賢們爲彌補地域上的先天不足，作出了種種不懈的努力，而于編纂地方總集外，他們也編纂全國總集，以應付科舉和學習文化知識之需。從《唐三百家文粹》《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直至今天的《全宋文》等，均可看出蜀人對總集編纂的重視。

編纂總集是保存和傳播詩文的好方法，自《詩經》《楚辭》《文選》以下，一直到今天，這一優良傳統始終得以繼承和發展。在這一特定的領域，巴蜀大地有着突出的貢獻，巴蜀地方總集的編纂源遠流長，表現不俗。據《蜀中廣記》卷九七所載，早在唐大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前後，岑參任嘉州司馬時，編有《嘉定詩》，是較早的地方詩歌總集。王蜀時嘉州司馬劉贊編有《蜀國文英》八卷，北宋時章竊編纂《成都古今詩集》六卷，南宋嘉定中廣都費士戣纂集《固陵集》二十卷^①，可惜這些地方總集失傳已久，無從考見其編錄情況。

今存最早的蜀地總集，是五代後蜀趙崇祚編選的《花間集》，這也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人詞總集，所收作者十八家，多爲蜀人或在蜀任官、生活者，史

^①《全蜀藝文志》嘗引用李光編《固陵文類》，劉琳、王曉波先生認爲：“四川師範大學王文才教授在所著《楊慎學譜》（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中認爲《固陵集》就是《固陵文類》，很有道理。大概是費士戣領銜，而實際編者爲李光。”（《全蜀藝文志·前言》，綫裝書局，二〇〇三年版，第四頁）

稱“花間詞派”，收詞“五百首，此近世倚聲填詞之祖也”^①。

流傳至今的《成都文類》五十卷，由袁說友囑托扈仲榮等編纂於慶元年間，則為我們考察蜀地總集編纂情況提供了又一個範本。“所錄凡賦一卷，詩歌十四卷，文三十五卷。上起西漢，下迄孝宗淳熙間，凡一千篇有奇。分為十有一門，各以文體相從，故曰‘文類’。每類之中，又各有子目，頗傷繁碎，然《昭明文選》已創是例，宋人編杜甫、蘇軾詩，亦往往如斯，當時風尚使然，不足怪也。以楊慎《全蜀藝文志》校之，所載不免於掛漏。然此集創始難工，而慎書踵事而增，則易於為力，固不能一例視之”^②。是書在編例上踵承《文選》，詩文兼收，按文體編排。所收詩文，以事涉成都（實則泛及全蜀）為準，而不論作者是否蜀人，而成都作家作於他處之文，也不列入，完全符合地方總集的編纂方法。所收詩文，以宋代居多，卷帙較司馬劉贊《蜀國文英》八卷、章燾《成都古今詩集》六卷已大幅增加，宋代蜀郡人文盛況，於此也可略見一斑。據袁說友序：“爰屬寮士，摭諸方策，哀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炫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求精，即摘錄為成都而作的名篇，從而繼承了《文選》的選文標準；二是求全，即將“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則是凡所謂名篇者，盡量登錄，因此數量增多，不可能做到篇篇精華。貪多與求精本是兩個不同的標準，揉作一體，結果只能是既不精也不全。該書從發凡起例之初，就已埋下體例不純的禍根，為人詬病，理所當然。不過，也有因禍得福之處：因求全而保存了不少珍貴文獻，書中不乏僅見於此的篇章，連後來的《全蜀藝文志》也不載，其文獻價值因此倍增，為人所重，得以留存後世。該書有清鈔本、《四庫全書》本及今人趙曉蘭整理本（中華書局，二〇一一年出版）。

楊慎所編《全蜀藝文志》，成於明嘉靖二十年，序稱“始事以八月乙卯，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軫，廿八日以畢”，二十八天編成百餘萬字的總集，其神速固然令人驚嘆，但也與編纂基礎密切相關：“先君子在館閣日，嘗取袁說友所著《成都文類》、李光所編《固陵文類》及成都丙丁兩《記》《輿地紀勝》一書，上下旁搜，左右采獲，欲纂為《蜀文獻志》而未果也。大中丞東阜劉公禮聘舊史

①（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氏玉壘王君舜卿、方洲楊君實卿編錄全志，而謬以藝文一局委之慎。乃檢故籍，探行篋，參之近志，復采諸家，擇其菁華，裒其繁重，拾其遺逸，翦其稂稂^①。”可見，楊慎是在其父所編未完稿《蜀文獻志》的基礎之上，為《四川總志》編纂藝文部分，又參考出土文獻，而成是編。因此，盡管速成，但編纂質量仍不低，劉琳、王曉波先生認為：“《全蜀藝文志》之所以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還在於楊慎選錄詩文的標準與一般詩文選集有所不同，一般詩文選集主要從文學的角度來進行選擇，而楊慎的視野則更為廣闊，他更注意於詩文的史料價值，也就是說，他更注意從史志的角度來選文。”“較之《成都文類》，增加了世家、傳、碑目、譜、跋、行記、題名等文體，這說明前者收文的範圍較之後者更為廣泛。在這些文體下所收錄之文，多是珍貴的四川史資料^②。”楊慎雖說是文學大師，但因為修志的緣故，他增加類目，選錄具有史料價值的詩文，以符合通志的要求，從而造成了《全蜀藝文志》與一般詩文選集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不過，按文體編纂，仍同於《文選》以下諸選集，故明俞廷舉稱其“卷帙浩繁，各體具備，不啻《昭明文選》”^③。至於選錄文章的範圍，“凡名宦遊士篇咏，關於蜀者載之；若蜀人作僅一篇傳者，非關於蜀亦得載焉，用程篁墩《新安文獻志》例也。諸家全集，如杜與蘇，盛行於世者，只載百一，從呂成公《文鑑》例也。同時年近諸大老之作，皆不敢錄，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吳敏德《文章辨體》例也。”選錄有關巴蜀的詩文，正是地方總集的編法；詩文非關蜀事，但作者是蜀人且作品傳存稀少，也予以甄錄，也符合地方志藝文因人存文的編法；至於不錄同時人作品，以免好惡褒貶之譏，也是審慎的修志態度。可以說，《全蜀藝文志》絕非倉促成編，應付了事，而是楊慎傳存鄉邦文獻的用力之作。

明代鈎輯蜀地總集者，還有傅振商輯《蜀藻幽勝錄》四卷，曹學佺輯《四川集》五卷，費經虞輯《蜀明詩》十五卷。近人吳虞輯有《蜀十五家詞》十七卷，傅增湘輯《明蜀中十二家詩鈔》。今人李誼有《歷代蜀詞全輯》《歷代蜀詞全輯續編》，廖永詳輯有《蜀詩總集》十二卷，許吟雪、許孟青輯有《宋代蜀詩輯存》等。

此外，蜀人還編纂刻印了一些總集，如成都呂商隱編《三蘇遺文》，眉山成

① 劉琳、王曉波校點《全蜀藝文志·序》，綏裝書局，二〇〇三年，第十一頁。

② 劉琳、王曉波校點《全蜀藝文志·前言》，第五頁。

③ 劉琳、王曉波校點《全蜀藝文志·序》，第十三頁。

叔陽編《唐三百家文粹》四百卷等。五代後蜀韋穀編選《才調集》十卷，以“韻高”“詞麗”為選錄標準，收錄唐詩人一百八十人，詩一千首，是現存唐五代人選唐詩中規模最大的一種。而無名氏所編《二百家名賢文粹》三百卷，今存近二百卷，前有王稱序，稱：“吾鄉抑文章之所自出，鄉人有欲集國朝聞人勝士之文，刊為一集者，屬予為序。”則是書乃眉山人所編，當與《唐三百家文粹》性質相類，未知是否也為成叔陽所編。其成書時限在宋寧宗慶元二年（公元一一九六年）前後，稍晚於呂祖謙所編《宋文鑑》，分論著、策、書、碑記、序、雜文六大類，六十二門，與《宋文鑑》所分六十一門大抵相當，選文及編例均沿用《文選》之法。唯所選二百家之中，蜀人已近六十家，幾乎佔有三分之一的分量，對蜀文輯佚具有重要價值。所收文章，宋人文集漏收者也不在少數，如收錄斜川居士蘇過文章十餘篇，見於《斜川集》者僅一篇，其文獻價值十分珍貴。

清乾隆年間，李調元輯《全五代詩》一百卷，較《全唐詩》略有增補。四川大學古籍所編纂《全宋文》，則是當今蜀人對總集編纂的最新貢獻。

三、《宋代蜀文輯存》的編纂體例

傅增湘先生以一己之力編纂《宋代蜀文輯存》，旨在“揚蜀國之光華，即以彰一朝之文治”。其編纂體例，詳具卷首“凡例”，與傳統地方總集編纂方法相比，頗具特點：

首先，只收集外文，不錄詩詞，輯錄對象與一般地方總集有明顯的區別。傳統地方總集，如《成都文類》《全蜀藝文志》《吳都文粹》等，一般遵從《文選》的編法，詩文並錄，雖類屬總集，而實則為詩文選集。《宋代蜀文輯存》則僅收文章，傅先生說：“自來總集如《唐文粹》《宋文鑑》之類，皆詩文並採，今編中諸人遺詩正復不少，只緣力有未逮，不得兼營，蜀詩之輯，留俟後賢。”可見，傅先生不收詩詞，並非刻意為之，而是“力有未逮”。同樣，不收釋道及婦女作品，也是“力有未逮”，用傅先生的話說就是“非敢歧視，實以力孱智短，不及旁鶩”。在收錄文章方面，與傳統地方總集多採用選錄不同，“本編意主網羅放逸，凡其人文集之失傳者，有見即錄，不加選擇。惟公牘文移徙存格式，初無言論者，則徑予刪削，然或其人文字罕見，亦間存一二。”有別於前人的選錄，而是“意主網羅放逸”，只要是現存別集以外的佚文，都在收錄的範圍，自然符合“輯存”的體例，而“與《文選》之旨亦異，蓋欲使前人已佚之集借此復傳於世”。

不過，對一些“徒存格式”的文章，或“徑予刪削”，或“間存一二”，取舍標準，很難做到前後一致。

其次，巴蜀佚文，僅採宋代，也是其特色之一。一般地方總集採錄作者詩文，往往不限朝代，多取前代及當代之文，以彰顯本地人文盛況。《宋代蜀文輯存》則局於宋代，“蜀文總集，今所傳者莫先於扈仲榮等所編之《成都文類》，其書最稱罕秘，四庫鈔本外惟故宮圖書館藏有明刊，余領館事，時得取觀焉。其次則楊慎所編之《全蜀藝文志》，蔚然大觀。若傅振商之《蜀藻幽勝錄》，斯簡陋無足取矣。然諸書所採，皆以文涉於蜀爲斷，而撰者不皆蜀人，其人亦不限於宋代也。茲編主旨，凡爲蜀人皆在所錄，視諸書義例爲寬，而畫以時代，是爲途轉隘。”傅先生纂輯宋文，旨在“揚蜀國之光華，即以彰一朝之文治”，並認爲這是“不朽盛業”。蕭方駿稱：“獨是輯文之法，有綜數代而輯者，有就一代而輯者，大抵皆合天下之人文而萃於一集焉。若只輯一代之文，而又限於一省者，則爲途既隘而取材益艱，非公讀書之勤，見聞之富，殆未易語此。”至於爲何獨輯宋代，而不涉漢、唐、元、明，實因宋代乃中華文明的高峰期，而蜀文之盛，也無過於宋，用傅先生友人長壽孫鴻猷的說法，就是“欲網羅吾全蜀之文，蓋無逾於天水一朝”。

再次，編纂方法，獨具一格。地方總集大多按類編排，或按文體，或按內容，而《宋代蜀文輯存》則以人爲經，以時代爲緯，“本編以人爲主，其人略以時代先後爲次，文多者人占一卷或數卷，少者數人合爲一卷。”蕭方駿謂：“就其人之年代，文之先後，甄綜而次第之，按其姓氏、爵里、生平爲小傳，表諸首，略仿元遺山選《中州集》以詩繫人、以人繫傳之意，而宋代（四）〔三〕百餘年間名篇巨製，墜簡逸文，悉萃於一編，覽者可以明夫吾蜀人才盛衰得失之故矣。”此種編法，傅先生自認爲得益於陳子龍《經世文編》：“茲編大旨以文存人，略仿陳卧子《皇明經世文編》之例，人自爲卷，不發門類，與歷代之《文粹》《文鑑》不同。”不過，早在陳氏之前，宋無名氏所編《聖宋文選》，收錄“自歐陽修以下十四人，惟取其有關於經術、政治者，詩賦碑銘之類不載焉”，人自爲卷，所收張耒文多達七卷。可見，按人編年，以文多少分卷，這種方法早已有之，並非發凡起例於陳子龍，傅先生只是略舉所見，或許也有“經世”之志吧。

按類編排與按人存文，各有優劣。就地方文獻而言，按類編排，更利於觀覽，故歷代地方總集多以類相從。而《宋代蜀文輯存》之旨，意在網羅放佚，則以人爲主，自然恰當。至於作家作品的編排次第，傅先生稱“其文之次第，略仿

《宋文鑑》之例”。《宋文鑑》原名《皇朝文鑑》，宋呂祖謙編，其所選詩文，按賦、詩、騷、詔、制、奏疏、表、銘、頌、贊、碑文、記、序、論、策、書、啓、雜著等文體分類排列，《宋代蜀文輯存》所收文章，也按文體排列，其順序大體依照《宋文鑑》。

對同一類文體下的不同篇章，則依所採書籍的時代先後排列，並注明出處。“凡文俱注原書出處，並詳記卷第，以便檢尋。惟採自方志者多未詳記修纂年代，嗣知其缺漏，而原書久已分散，無從追補，特此申言，誌余疏失。”這是傅先生嚴謹之處，值得肯定。“所引諸書，務求善本，如《諸臣奏議》《宋文鑑》《播芳大全》皆從宋板鈔出，其餘亦多舊刻明鈔，視時本特為精確。惟《二百家名賢文粹》三百卷，係蜀中選刻，所存蜀人為多，余幸得殘本，未睹全編，特誌於此，冀吾鄉人得據以訪尋焉。”以大藏書家更兼遍訪海內藏書，存其善本，賦予《宋代蜀文輯存》較高的文獻價值，傅先生對學術負責的做法，尤其值得稱道。“采輯之書，別為‘引用書目’以備稽考。惟其中孤本秘籍多出借觀，原書既不無差失，傳寫更未免奪訛，迨至付刊之日，原本已不可尋，故凡有文義難通，無從校正者，未敢輒改，以示闕疑。”注明引書出處和附錄引用書目的方法，乃現代學者司空見慣的做法，可以說是學術規範。而在傅先生之前的總集編纂者，往往不會這樣做，敝帚自珍，秘不示人，讓後人大費周章地尋繹出處，比起傅先生這樣坦誠示人的做法，高下立見。

至於鈎輯文獻的方法，傅先生在自序中也有總結，可資借鑒。

至采輯之事，語其倫次，可分數端，先取於蜀文之總集，如《成都文類》《全蜀藝文志》之類是也。次取於宋文之總集，如《皇朝文鑑》《播芳大全》《名賢文粹》《碑傳琬琰集》之類是也。宋文存者，以章奏為多，《宋史》所載，不無節略，故先取之《諸臣奏議》，次則取之《歷代名臣奏議》，大率皆鴻裁鉅製，首尾相聯。又次則史籍之中，蘊材特富，如《通鑑長編》《北盟彙編》《繫年要錄》是也。惟卷盈數百，披檢難周，最後得《宋會要稿》《中興禮書》，卷帙尤豐，典制大文，最為賅博，而卷次凌雜，門類紛繁，瀏覽踰年，始得藏事。雖採文無幾，而致力已勤，斯皆犖犖大者。第其中多有秘鈔孤槧，固非常人所得窺觀也。地理之書，惟方志統系分明，為用滋廣。一統志有人而無文，通志藝文所收，類皆習見，惟石倉撰《蜀中廣記》，多見古書，時有遺篇，足資掇拾。